

# 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 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

收稿日期：2003年11月13日

接受日期：2004年11月26日

胡家瑜\*\*

本文主要探討十九世紀末至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各種不同類型博覽會中臺灣原住民相關展示的社會性與物質性脈絡。這些博覽會除了促進貿易、提昇科技和大眾教育等目的之外，還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圖；其中因舉辦地點、規模、和主要觀眾的不同，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1)在歐美舉行以西方民眾為主要觀眾的國際性博覽會；(2)在日本內地舉行以日本民眾為主要觀眾的博覽會；(3)在臺灣舉行以臺灣民眾為主要觀眾的博覽會。這些博覽會都透過物質符號、圖像、或真人的掌控、挪用和組合再現，將原住民建構為代表「自然」、「原始」或「落後」的「他者」，以此襯托和凸顯殖民者的文明、進步和優越性。運用類似物質或圖像而再現的原住民意象，在不同情境脈絡的博覽會中，形成不同層次的對比並傳遞不同層次的訊息；例如在臺灣本島的博覽會，強調臺灣原住民生活落後/臺灣殖民地新建設的對比；在日本內地的博覽會，強調臺灣殖民地/日本母國的對比；在國際性的博覽會場域，則延伸為日本東方文明/歐美西方文明的對比。透過博覽會華麗和歡樂氣氛的包裝遮掩，殖民過程中複雜的權力關係和矛盾衝突被中性化與合理化，轉變成社會大眾休閒消費的重點，反覆地在奇觀式的展覽中延續。雖然，當代原住民與展示的關係，隨著時空情境移轉已產生很大變化；但檢視過去建構的「他者」意象和其背後流動的隱喻對比關係，仍是思考異文化再現時不應忽略的重要議題。

**關鍵詞：**殖民博覽會 文化意象 展示政治 再現 物質符號 他者

---

本文於民國94年(2005)2月出版。

\* 本文初稿發表於「台灣史前史與民族學研究新趨勢—慶祝宋文薰教授八秩華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修改過程中特別感謝石川豪同學協助日文資料的收集和翻譯，以及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許多寶貴意見和具體建議。

\*\*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博覽會，這真是新奇又偉大的點子。因為這裡可以聚集各種各樣雄偉驚人的機械設備；可以增進生產、加強溝通、促進更自由的商業貿易；這裡是各種貨物集合羅列的地方；更重要地，這裡是將商業和娛樂結合起來的最好機會，讓做生意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日可以合而為一。」

~Patrick Geddes 1900

## 一、博覽會與現代社會

博覽會，在一般印象中總是給人熱鬧、豐富、充滿歡樂和驚奇的嘉年華會聯想。無論是地方、國家、或世界博覽會，人潮、商品和各式各樣的展覽館大概是最主要的構成元素。不過，博覽會除了具有強烈的大眾消費和通俗娛樂特質之外，它也是現代社會建構的特殊文化景觀，是許多意識型態具體化、合理化、普遍化，以及權力關係運作與展現的場域(Ames 1992; Clifford 1997)。由於博覽會涵蓋了這些複雜特性，因此有人稱之為「現代性的殿堂」(temples of modernity)、「商品拜物教的朝聖地」(sites of pilgrimage to the commodity fetish)，或是「大眾文化博物館」(museums of popular culture)的一種特殊類型。<sup>1</sup>

事實上，博覽會的緣起最早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之後。當時西歐國家為了促進工商產品流通，從市集概念發展出一些臨時性的展覽會。根據文獻記載，這種形式的工商展覽會最先在法國開始舉辦，主要是匯集各種新興產物在公開場所陳列展示，以此刺激廣大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群眾的消費慾望。1797年，法國工業資本家 Marquis d'Aveze 和 Francois de Neufchateau，在羅浮宮前廣場率先舉辦了一次大型展覽會，聚集他們所生產的瓷器、地毯和紡織等物品公開展示；雖然當時的展出時間只有四天，但卻吸引了大批觀眾，創下驚人的銷售成績。這種運用展覽會公開展示各種貨物，讓民眾可以親眼看見商品樣本，增加購買興趣和激發消費意願的手法，不但成功地促使交易數量增加，同時也達到向民眾展現國家工業成就和能力的效果。因此，舉辦工商展覽會的概念，很快地從法國散佈到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各地不但爭相舉辦展覽會，而且次數越來越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根據現有資料顯示，英國在十九世紀的前五十年間，就曾經舉行了至少十次以上頗具規模的工商展覽會。<sup>2</sup>

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博覽會更加快速地蔓延和蓬勃發展，除了經濟因素之外，也與科技工業發展和國家控制力的增強有密切關係，國家政府力量介入和影響博覽會的比例

---

<sup>1</sup> 分別引自 Rydell & Gwinn 1994:3; Benjamin 1978:151; Ames 1992:111。

<sup>2</sup> 參考 Greenhalgh 1988; Rydell & Gwinn 1994。

越來越高。隨著西方殖民勢力向外擴展，博覽會不再只是工商業者自行舉辦的交易市集和嘉年華會，而逐漸轉變成為世界列強對內、對外展現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優勢地位的有效機制(Greenhalgh 1988:3-6)。總之，從 1851 年英國倫敦水晶宮舉辦第一次萬國博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起，至 1940 年代二次大戰結束前的近一百年期間，可以說是博覽會發展的顛峰時期，各國紛紛以不同的理由舉行氣勢宏偉驚人的大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s)，彼此相互競爭比賽。粗略估計，這個階段全球各地至少舉行了二百次以上的大型國際性博覽會。<sup>3</sup> 這些大規模的博覽會，雖然仍具有促進工商和經貿發展的作用，但不同於早期的工商展覽會，很少在會場內直接進行產品的銷售，而是強調商品的展示與觀念的展示；甚至經常高喊「促進國際和平、教育、和進步」等崇高理想口號。但是，這些輝煌偉大的博覽會背後，實際上卻都糾纏著矛盾的意識型態和複雜的權力關係(Benedict 1983:3; Greenhalgh 1988:17)。

由於博覽會是現代社會發展過程衍生出的一種獨特公共場域，1970 年代以來已有一些研究者從不同層面進行博覽會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討論。例如，有些從權力關係的角度切入，思考博覽會在現代國家發展過程中對分類秩序和道德規範的建構，以及對社會控制和集體認同意識造成的影響(Foucault 1970、1977; Silverman 1977; Wallis 1994; Harvey 1996)。另外，也有人強調博覽會與大眾消費和流行文化的關連、其中隱含的階序、社會價值和生活品味差異，以及「異國情調」商品化等問題(Benjamin 1978:151; Said 1973、1978; Greenhalgh 1988; Wallis 1994; Bennet 1995)。其中，也不乏人類學者以博覽會為對象，探討文化展示、知識建構、以及跨文化接觸等相關議題(Ames 1992; Benedict 1983、1994; Clifford 1997)。這些研究討論對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現代性、公共性、他者性、差異區辨、和展示再現的交互作用，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觀點。

近十年間，台灣也開始有學者針對博覽會的歷史或展示設計進行了一些研究。<sup>4</sup> 不過，從人類學角度探討博覽會和異文化展示再現問題卻幾近於零。因此，本文試圖針對十九世紀末至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各種不同類型博覽會中台灣原住民相關的展示進行討論。一方面藉著分析博覽會中區辨和挪用的原住民物質文化和具象符碼，如建築、器物、圖像和真人活動等，檢視不同元素的再現特質，並思考「他者」意象形塑的可能模式。另一方面則嘗試採取動態對話的觀點，從博覽會中不同人群的互動

---

<sup>3</sup> 參見 <http://www.lib.csufesno.edu/subjectresources/specialcollections/worldfairs>; Burk 1994; 吉田光邦 1999。許多大規模國際博覽會舉行的名目，直接的表明國家集體意識或政治意義，例如 1889 年巴黎博覽會是慶祝法國獨立百年；1893 年芝加哥博覽會為慶祝哥倫布登陸新大陸；1904 年美國聖路易博覽會慶祝美國向法國購買路易斯安那州納入了新領土等。

<sup>4</sup> 相關研究參見呂紹理 2000, 2002; 林文通 2003; 程佳惠 2001; 趙祐志 1997; 鄭建華 1999; 鄭梓 2000; 劉融 2003。

經驗與迴響，如展示建構者、殖民統治者、原住民、主要消費群眾等，進一步理解權力、意識型態、科學知識、技術、與消費娛樂等因素的複雜勾連關係。

## 二、殖民博覽會中的台灣與原住民

目前文獻中有關台灣登上大型博覽會舞台的記錄，最早應該是 1873 年的維也納萬國博覽會。當時台灣還在大清帝國的管轄之下，因此相關展示主要由大清帝國淡水海關聘用的一些英國關員如 R. Hastings, Tidewater, R. Lent 等人所策劃，安排做為「中國館」展覽的一部份。這次的展覽非常簡單，只是採開架方式將展品零散地擺放在台架上；展品主要是當時界定的台灣特產，如煤、米、茶葉、糖、樟木、樟腦、藥材、籐、麻、通草紙、扇蓆等。其中常見的一些原住民交換物品，如「織布機和布」、「兵械及器具」、「生番麻」、「生番布」等，也夾雜在自然產物之中，被挑選做為台灣特產的代表(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73)。雖然這次參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促銷台灣物產；不過或許由於展示陳列方法粗糙簡陋，結果並未引起太多關注。

相較之下，1895 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日本殖民政府才逐漸開始積極地在博覽會中展示台灣，並且普遍地運用台灣原住民做為展現台灣特色的代表。事實上，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政府就非常努力地學習歐美近代文明希望能夠迎頭趕上，其中參與或舉辦博覽會也被視為一項重要的管道，可以用來促進工商發展和顯示國家現代化的程度。因此，從 1870 年代起到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不但經常遠赴海外參加各種國際性博覽會；同時也不斷在國內舉辦規模大小不同的全國性或地區性博覽會(見附表一、二)。<sup>5</sup> 大約在 1900 年以後，台灣殖民地的狀況逐漸穩定，為了介紹日本新領土—台灣—的風土物產和

<sup>5</sup> 日本參與的國際博覽會，最早從 1862 年幕府派遣使節團赴倫敦萬國博覽會見習起，1867 年薩摩、佐賀二藩開始正式參加萬國博覽會。明治維新後，日本以國家主體第一次正式參加的博覽會是 1873 年的維也納萬國博覽會。至 1942 年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到海外參與了近百次的國際性博覽會，包括特殊性的器械博覽會、漁業博覽會、園藝博覽會、金屬工藝品博覽會、裝飾美術博覽會、商業博覽會、農工博覽會、礦業博覽會、傢具博覽會、寫真博覽會等；以及展示規模最龐大複雜的萬國博覽會；參見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 1992：275-277。此階段，日本在國內舉行的各種全國性或地區性博覽會也將近七、八十次以上；其中重要的如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1877 年第一回、1881 年第二回、和 1890 年第三回都在東京上野公園，1895 年第四回在京都岡崎公園，1903 年第五回在大阪天王寺宮)、1907 年東京勸業博覽會、1912 年拓殖博覽會、1913 年大阪明治記念拓殖博覽會、1914 年東京大正博覽會、1922 年東京平和紀念博覽會、1928 大禮紀念京都大博覽會等。隨著日本殖民勢力的擴張，在殖民統治和佔領地區也先後舉辦各種博覽會，如 1915 年朝鮮物產共進會、1916 年台灣勸業共進會、1925 年大連勸業博覽會、1930 年滿州大博覽會等；參見吉見俊哉 1992：127。

日本的殖民成績，台灣也開始變成日本參與和舉辦國際或國內博覽會時的重要展示主題之一。1910 年代之後，日本在台灣的統治根基日益穩固，基於振興殖民地產業、向殖民地人民宣揚治理教化理念和功績等不同理由，殖民政府也陸續在台灣島內舉辦過多次共進會或博覽會(見附表三)。

總之，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期間，日本政府參與或舉辦的各種不同層級、不同規模博覽會，都經常涵蓋有台灣相關展示；而且這些展覽除了陳列工商產品和天然物產之外，也經常將台灣原住民做為呈現的焦點。其中較重要的幾次，包括如 1900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1903 年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1907 年東京勸業博覽會、1910 年倫敦日英博覽會、1912 年東京拓殖博覽會、1913 年大阪明治紀念拓殖博覽會、1914 年東京大正博覽會、1916 年台北的紀念始政二十週年台灣勸業共進會、1928 年大禮紀念京都大博覽會、和 1935 年台北的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等。<sup>6</sup> 這些博覽會中對於台灣原住民的展示，雖然手法、規模不盡相同，但卻可以看出當時異文化展示構成的一些基本要素和特性。

台灣首次被日本搬上國際博覽會的展示舞台，應該是 1900 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當時有關台灣的展覽是在「日本館」的「地理科學教育」單元內；主要是要向西方世界介紹日本的新領土——台灣，以及台灣領土上居住的特殊人種。<sup>7</sup> 其中有關台灣人種的展示重點就是台灣原住民，展覽綜合了當時地理學和人類學研究的知識概念，安排有台灣族群分佈地圖、原住民相貌圖、以及各族物質文化標本與模型等展示(伊能嘉矩 1899：36、37)。除了參加歐美國家舉行的國際博覽會之外，1910 年日本還曾鄭重地與英國合作，在倫敦(Shepherd's Bush)舉行了一次規模盛大的「日英博覽會」(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見圖版一)。這次博覽會的規模之大、展示項目之多，以及投入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之高，遠遠超越了日本參加的其他國際博覽會。會場除了設置有許多日、英二國工商產業、藝術、和文化生活展示館外，日本還針對當時殖民勢力控制的地區——台灣、韓國、關東和南滿，各設置一個展示廳。其中「台灣廳」的展示包含有台灣產物，如茶葉、樟腦、米、糖等；並且運用不少原住民的物質文化標本和模型，對照呈現台灣居民

<sup>6</sup> 其他還有不少博覽會也安排有臺灣相關展示單元，其中可能也涵蓋有規模較小的台灣原住民展示。國際性的如 1904 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或 1925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或 1937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現今法國巴黎人類館中收藏一批 1937 年由移川子之藏教授捐贈的台灣原住民和史前文物約有 20 多件，可能是當時參與展覽留下的展品)等；日本國內的如 1910 年「關東北共進會」、1925 年大阪台灣物產博覽會、1925 年東京乃木阪共進會、1933 年奈良觀光產業博覽會等。參見法國檔案館所藏 Japon General Official Catalogue, Paris, 1925：611-621；Fletcher 1905；陳金田譯 1997。

<sup>7</sup> 參見 1900 年博覽會東京地理學會申請書，現藏於法國國家檔案館，F12/4252；以及 1900 年博覽會日本展覽目錄，現藏於巴黎市立檔案館。

過去生活的落後和現代生活的進步。除了「台灣廳」的靜態展覽之外，會場還設置了一個有真人居住展出的「福爾摩沙土著村」。<sup>8</sup> 當時日本展覽委員會總督和田彥次郎(Hikojiro Wada)在官方出版記錄中提到這次博覽會的作用：「不但具有商業價值，獲得許多有用的貿易知識，有助於打開許多歐洲新市場；也明顯具有政治和外交作用，增進了東、西方二大文明國家的互相認識和友好關係」(Commiss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1)。整體而言，這次博覽會凸顯出日本安排臺灣原住民展示的雙重作用：一方面做為過去「原始」生活的樣本，藉此對比日本統治臺灣後居民生活現代化和「進步」的成果；證明日本具有強大的能力和勢力，可以與歐美世界近代文明國家並列。另一方面，則是將臺灣原住民奇特的風俗習慣，運用做為宣傳和吸引觀眾參觀消費的最佳賣點。<sup>9</sup>

台灣和台灣原住民成為日本內地博覽會的重要展示主題，最早應該是在 1903 年大阪舉行的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此次博覽會中有關台灣領土和台灣住民的展示，規模龐大，設計搶眼，讓日本民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當時台灣總督府在會場興建了一棟獨立的「台灣館」，向日本國民介紹台灣和台灣住民(漢人和原住民)的風俗、文化與產業，誇耀他們在新領土的施政結果；同時還開設了一間「台灣喫茶室」，做為『集合台灣精髓的一個大廣告館』(臺灣教育會 1903：50；又吉盛清著、潘淑慧 1997：76)。除此之外，「東京人類學會」也規劃設置了一間『人類館』，從進化論的觀點比較日本周邊不同的人種；其中「日本古今的住民」單元，也涵蓋有台灣原住民相關展示(伊能嘉矩 1904：76-83；坪井正五郎 1903：302)。<sup>10</sup> 此次博覽會受到日本民眾熱烈的歡迎和迴響，參觀者據統計超過 530 萬人；展覽期間，台灣總督府也安排了四百多位台灣菁英份子如商人、公學校教職員和街庄區長等到大阪參觀博覽會，希望藉此對殖民地人民產生柔性教化和同化的影響。<sup>11</sup> 由於此次博覽會「台灣館」和「台灣喫茶室」獲得很大的好評，因此後來 1907

<sup>8</sup> 倫敦日英博覽會場另外還設有「愛奴村」和「日本民俗村」，其中也運用活人展演，從不同角度對比日本文明和現代化生活。

<sup>9</sup> 日英博覽會展期由 1910 年 5 月 14 日到 1910 年 10 月 29 日，將近五個月，據說吸引了超過 800 萬名遊客，最高一天超過 46 萬人；從日本專程到英國參觀的遊客也約有 2000 人，包括國會議員和知名企業家等上流人士。如果不是因為剛巧英國國王在展覽開幕前不幸突然逝世，國喪期間不能太過鋪排宣傳，否則參觀人數可能會更多。參考 London Times, 1910/11/2。

<sup>10</sup> 這個展示主要由「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的坪井正五郎教授規劃，在「日本古今的住民」單元中共分為六個子題，包括蝦夷(愛奴)部族、現代日本種族、琉球人部族、台灣原住民部族、上古日本種族、和石器時代的人民。

<sup>11</sup> 《台灣教育會雜誌》提到「內國勸業博覽會是明治政府在自覺較西歐近代文明發展落後下，為了向國內外誇示其國威而舉辦的。至於台灣人的『內地觀光』正是台灣總督府的一種示威行動，讓台灣民眾參觀近代的日本技術與文明，教之以反抗是一種無意義的行為，以作為同化的一種手段。」；參考又吉盛清著、潘淑慧 1997：76。

年『東京勸業博覽會』、1912年『東京拓殖博物館』、1914年『東京大正博覽會』，以及許多地方性博覽會和國際性博覽會，也都設置「台灣館」和「台灣喫茶店」做為展現台灣特色的場域。其中「台灣喫茶店」打開了台灣烏龍茶的海外聲譽；「台灣館」則透過台灣產業、人種、原住民風俗和生活狀態等相關展示，不斷地向日本民眾介紹帝國新領土、殖民地產業與施政教化成績(月出皓編 1907；吉井弘治 1910；吉見俊哉 1992：213)。

除了國際與日本內地博覽會之外，日本殖民政府也曾多次在台灣島內舉行博覽會，並且經常展出原住民相關的生活、習俗和器物。其中規模和影響較大的有二次，一次是1916年的「台灣勸業共進會」，另一次是1935年的「台灣博覽會」。<sup>12</sup> 1916年的展覽，主要是為了慶祝施政二十週年和台灣總督府建築落成；其中第二會場設置有一棟「番俗館」，專門展出台灣原住民的風俗品；同時，賣店也販賣原住民特產如小米餅和明信片，讓遊客購買做為觀光紀念品(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 1916)。<sup>13</sup> 1935年的博覽會主要目的是慶祝日本統治台灣四十年，全名為「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會場設置了各種專題展示場，對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工業、交通、保健、司法等各方面成果進行全面性的宣傳。<sup>14</sup> 台灣原住民相關的展示，主要設置在第二會場的第二文化設施館，館內透過呈現山地治理成果和山地生活改進的樣貌，宣傳台灣朝向進步和現代化發展的成績(見圖版二)。除此之外，還有名古屋館、北海道館、滿州館、朝鮮館、南方館、暹羅館、菲律賓館等文化特設館，增添異國情趣和娛樂效果(始政四十週年台灣博覽會協贊會 1939)。總之，此次博覽會規模宏偉、聲勢浩大；據官方統計短短五十天展覽期間，一共吸引了273萬人參觀，而且大多數人在參觀後，都對展覽效果表示非常震撼驚奇。<sup>15</sup>

二次大戰結束後，國家主導舉辦博覽會的風氣逐漸衰減。不過，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之後，1948年還曾為了慶祝光復舉行過一次「臺灣省博覽會」。當時的博覽會設置了五個會場十二個展示主題館；其中總統府旁介壽大樓內的「風土館」第一室包含有一

<sup>12</sup> 其他規模較小的博覽會還包括如1916年台灣勸業共進會、1917年衛生博覽會、1925年台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1925年始政三十年展覽會、1926年中部台灣共進會、1931年高雄港勢展覽會、和1938年支那事變博覽會等。

<sup>13</sup> 這個展覽由日本皇室閑院宮殿下和王妃前來開幕，時間自4月10日起至5月15日止為期共5週；總計參觀人數約有80多萬人。台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1916。

<sup>14</sup> 這是日本統治期間臺灣島內規模最盛大、民衆記憶最深刻的一次博覽會。根據官方記錄，籌辦總經費超過142萬日圓，主要會由台灣總督親自擔任博覽會總裁。當時分別設置了四個會場，將近有四十個展覽館。其中最大的第一會場，從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門前，沿西三線道路(中華路)往南至小南門。第二會場在當時的新公園內；另外還有大稻埕分場、和草山分館。台灣博覽會協贊會 1935。

<sup>15</sup> 展覽由1935年10月10日至11月30日止，參觀人數273萬人，超過當時台灣總人口數的二分之一；其中各地原住民參觀人數也大約超過6500人。台灣博覽會協贊會 1935。



圖版一 1910年倫敦日英博覽會會場入口景觀  
(Commiss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1)



圖版二 1935年始政四十週年台灣博覽會第二會場全景（台灣博覽會事務局 1936）



間「原住民生活與文化」展覽廳。這間展覽廳是由台灣大學陳紹馨教授策劃，展品主要是台灣大學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現今台大人類學系)的標本收藏和田野照片；主題內容劃分為三大單元：(1) 山地同胞概說、(2) 史前時代、(3) 現在的情形、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雖然展覽簡介非常強調這次展覽的學術目的：「一方面希望普及民族學意識，另一方面希望讓觀眾瞭解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外還有其他生活方式」。<sup>16</sup> 但是，這一場由剛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主導舉辦的博覽會，其中涵蓋介紹台灣風土人種知識的展覽，仍然隱約含有新政府宣示領土的意涵；而且仍藉著異文化的展示再現，來激起民眾參觀的興趣。<sup>17</sup>

總和而言，殖民博覽會中異文化展示再現的焦點，因博覽會舉行地點的不同、觀看對象的不同，而產生一些相對的差異和變化。就台灣原住民相關展示而言，在國際博覽會中，由於面對的主要是歐美工業化國家觀眾，因此經常強調原住民的野蠻落後，對比顯現日本做為東方文明的優越性和現代化的能力，藉此提升日本的國際地位，以及日本殖民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在日本內地舉行的國家或地區性博覽會，主要針對台灣原住民的人種、奇特風俗、和施政教化成就，進行通俗性的介紹；以便向日本民眾介紹台灣殖民地的風土人情和統治成果，增激起國民的驕傲、尊嚴和榮譽，增強民眾對國家的向心力。在台灣本島舉行的博覽會，主要是為了向殖民地人民展現殖民行政的效率、功績和統治的威望，加強台灣人民對殖民政府的歸順臣服與認同；因此非常強調「理蕃」的過程，以及原住民過去和現代生活的對照。總之，做為一種社會文化產物，博覽會中的台灣原住民展示，有時是臺灣風土的一部份、有時是吸引遊客的「奇風異俗」賣點、有時是原始文明、落後進步的對比、甚至是人種學知識教育的具體材料，其角色作用隨著博覽會情境脈絡的差異而有不同層次的轉化。

### 三、物質符號與「他者」意象

博覽會中異文化展示運用的元素，都經過了「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過程，脫離原有的社會文化情境；這些元素移轉到博覽會場後，透過不同的組合方式，安

---

<sup>16</sup> 這次博覽會從 1948 年 10 月 25 日起為期六週。展覽內容在《公論報》「臺灣風土」第二十四期有一個「台灣省博覽會風土館第一室介紹專號」，包括陳奇祿先生的「風土館和文獻館介紹」，陳紹馨的「台灣山地同胞生活情形之民族學的展觀」、宮本延人「臺灣山地工藝一瞥」、以及金關丈夫和國分直一解說、立石鐵臣先生繪製的「臺灣先史時代人生活復原圖」；參見陳紹馨 1948；陳奇祿 1981：143。

<sup>17</sup> 策展人對這一點提出的解釋為：「風土館裡面，本來應該陳列漢族的風土習俗，但因時間短促，這一方面的準備也不夠，以致不得不集中於山地同胞的情形」；陳紹馨 1948。

排出一套新的再現脈絡，形成觀看者動態建構「他者」意象的基礎。基本上，博覽會中台灣原住民意象的再現，主要是透過空間和物質要素的陳列擺設塑造形成。其中具有影響力的視覺元素，不單只是展示品的挑選、分類、組合與擺放而已；甚至還包括更大範圍的建築和周遭環境。如果我們將博覽會場的展示館建築與環境，視為一種大型的展示品，那麼建築景觀不但形塑參觀者的第一印象，也經常輾轉反映出當地社會對展示主題對象的基本想像。例如，在日本內地或國際博覽會中，台灣原住民展示所在的「台灣館」，大多是雕樑畫棟、迴廊環繞的中國宮殿式建築，這種類型的建築，在外觀上直接凸顯出不同於日本或西方的中國和東方意象。其中蘊含的視覺對比區辨意圖，由 1907 年『東京勸業博覽會』展覽手冊描述「台灣館」的文字即可以看出：「進入東京勸業博覽會的第二會場正門左邊數步有一建築，全館蓋臨不忍池面，丹壁朱欄映水放異彩，廊腰縵迴簷牙高啄，獨縱支那公館式之美，不問可知即「台灣館」。而且台灣館設置在「不忍池」旁，也不只是為了水波蕩漾的美麗景觀而已，還更深一層地有意延伸形成日月潭的聯想(月出皓編 1907：5；見圖版三)。<sup>18</sup>類似的華麗中國宮殿式建築，也同樣運用於 1910 年在倫敦舉行的日英博覽會的「台灣館」(見圖版四)。這些在台灣之外地區舉行的博覽會，大多選擇使用特殊中國式建築元素做為展示台灣的空間背景，這種作法提供「非台灣」觀眾(日本或西方)簡單直接區辨「台灣」的基本元素。但是，進入「台灣館」之後，展示的主要內容卻經常是與中國文明不相關的台灣特產或原住民器物；其中視覺意象的矛盾或錯置，也反映出「異己」區辨想像的流動性和階序性。相較之下，在台灣舉辦的博覽會，由於社會情境和主要觀眾性質的不同，原住民展示大多有其獨立的建築或展示空間，而且很少採用具有明顯中國元素的建築。例如，1916 年「台灣勸業共進會」設立的「番俗館」，其建築風格雖然有意凸顯「異族風味」，但卻未採用任何具體的台灣原住民建築型式，而是混和了印尼風格的「南方民族」建築(見圖版五)。1935 年「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展出原住民主題的第二展示設施館，由於是以原住民的教化、現代化和進步變遷做為呈現重點，因此採用了新興的現代建築樣式做為形塑意象的切入點(見圖版六)。

當然，展示場內最普遍運用的物質元素還是原住民生產、製作或使用的器物。經過原有脈絡的割離和呈現場域的轉換，原本社會生活中製作使用的各種物品，挪移到博覽會場之後，其角色和意義也開始產生不同的變化。同樣的物品，隨著展示選擇和組合的差異，有時做為商品、有時做為科學實証的物質文化標本、或是工藝品與原始藝術品。

---

<sup>18</sup> 博覽會展示簡介形容，1903 年大阪博覽會的台灣館以北部圓山聯想為基礎；而 1907 年東京博覽會以中部的日月潭聯想為主要意象；據說「是代表台灣景觀雙絕」。參見月出皓編 1907：5-6。



圖版三 1907年東京博覽會的「台灣館」和不忍池（月出皓編 1907）



圖版四 1910年倫敦日英博覽會的「台灣館」入口  
(Commiss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1)



圖版五 1916年台灣勸業共進會第二會場的「番俗館」建築  
(台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 1916)



圖版六 1935年始政四十週年台灣博覽會的「第二文化設施館」  
(台灣博覽會事務局 1936)

不同展示取向的呈現結果，反映出詮釋觀點的差異，也反射出背後的文化權力運作關係(胡家瑜 2002；Hu 2001)。大體而言，博覽會展示的台灣原住民相關器物，最初主要是界定在商品的範疇；例如，1873年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中，將原住民生產製作的「生番布」和「生番麻」，與米、茶葉、糖、樟木、樟腦、藥材、煤等台灣特色的天然產物並行陳列展示。後來許多博覽會雖然增加了其他原住民相關展示單元，但都還包括原住民產業或產物主題；展出的原住民物產大致可分為三類：(1) 獸皮鹿角等山產；(2) 竹籐編器；(3) 「番布」。這些被視為原住民代表性商品的「原料」半成品或手工產品，相當程度反映出當時外在貿易市場對原住民商業價值的定位和建構。

除了商業貿易觀點的影響之外，十九世紀後半期開始，對於異文化展示實務操作影響更大的是「演化論」和人類學科的發展。這一波趨勢從實證科學知識的角度出發，將人類生產製作的器物視為可以客觀地代表其製作使用者的物質文化標本。因此，異文化器物的展示，不但是呈現種族文化特色的最佳媒介，也是具體對比區辨「他者」文明進化程度高低的實際證據。基於這樣的假設，越是能夠對比凸顯異己特徵的器物和圖像，越是成為受歡迎的「他者」意象再現元素。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之後，人類學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也被引入台灣。此後博覽會中台灣原住民相關展示，經常邀請人類學者擔任諮詢顧問或策劃者，或借助人類學調查研究所得的資料，運用種族分佈圖、人口統計資料、相貌照片、住屋模型，以及大量的「土俗」標本，如服飾、農具、食具、樂器、武器、貨幣、儀式用具等文化器物，呈現原住民的種族分類、聚落分佈、人口、進化程度、或是習俗特性，希望藉此表達客觀的科學知識教育性質。例如，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的台灣原住民展示單元，就是由東京大學人類學教室的坪井正五郎教授規劃，鳥居龍藏和伊能嘉矩二人負責整理和解說展品。他們一共安排了八個櫥櫃，分別陳列身體裝飾、衣服、織布、土器製造、武器、食物原料、食器、發火器、家屋裝飾等標本和模型；標本櫥櫃旁還有根據研究成果特別繪製出來的地圖和原住民相貌圖做為解說(見圖版七)。<sup>19</sup>

不過，這些展覽中隱藏的異文化器物展示陳列邏輯，仍強調運用物質圖像的視覺區辨對比特性，做為呈現原住民種族文化差異的代表。器物背後複雜的社會文化脈絡和意義，其實不是再現的重點。因此，博覽會中台灣原住民物質文化標本的陳列模式，主要是以綜合性的「功能—類型」分類為基本原則。在此架構之下，器物依照外型或技術的簡單或繁複分類排列，由簡而繁的排列順序，轉化成為器物製作使用社群文明進化程度的投射。例如，從1903年大阪第五次勸業博覽會的「臺灣館」展示中可以看出，採集自

<sup>19</sup> 1900年巴黎博覽會中的『台灣島蕃族圖解』，是根據伊能嘉矩的分類架構，以1989年「蕃情研究會」發會式展覽的鳥居踏查照片拼合成的各族相貌圖為基礎，請畫師彩繪成為服飾對比特性更加凸顯的各族相貌圖。此圖於1907年東京勸業博覽會時又再修改重繪使用。參考伊能 1899b：36、37，1904：76-83；胡家瑜、崔伊蘭編 1998：262、胡家瑜 2002：175。

台灣不同原住民族群的物質文化標本，綜合起來分為武器、農具、服飾、食器等幾個不同類別，每一個類別的器物標本擺放在一個獨立的展示櫥櫃或架台內展出，旁邊僅運用極少數的幾行文字，片段地敘述錯綜複雜的歷史文化意涵。<sup>20</sup> 此外，為了增加視覺效果，經常櫥櫃中的器物標本，還被刻意擺放成特殊怪異的形狀；如食具展示櫃中的湯匙被排成爬蟲類的形狀、武器展示架上的刀被排列成為箭頭狀(見圖版八)。總之，經過這種實際陳列擺放的組合運作，物質文化標本在展示空間內出現、呈現和再現的結果，是使得科學分類式的展示也傳遞出「奇異」和「原始」的訊息。

大體而言，博覽會展示運用原住民物質符號的組合排列，流動地傳達「自然」、「天真」、「奇特」、「野蠻」、「原始」、和「落後」等多層印象。這些印象經常進一步延伸出台灣社會未開化和等待被「教化」的聯想，因此成為殖民者表現統治管理效率以及宣揚「現代化」理想的對照基礎。這種展示意圖在 1910 年「日英博覽會」展覽委員會的正式報告中表達無疑：「(台灣館)在入口處，通道的一邊設置了一個描繪原住民在山野中過著原始生活的實景模型，另一邊則放置著一個台灣人民在茶園中安和快樂地工作的模型。透過這樣的安排，可以看見台灣在日本影響之下，人民生活由原始進步到現代的情況。」(Commiss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1：284；圖版九)。此外，1935 年在台北舉行的「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更細膩地透過物質和圖像的展示，塑造出殖民政府的「理蕃」成績與原住民生活從原始到現代化的進步歷程。當時有關原住民的展示安排在第二文化設施館的三個展示室；第一室展出「昔日的理蕃」，主要以山地風景和隘勇線做為場景，運用模型和實物呈現高山峻嶺中監管原住民的隘勇監督所設施；如事務所、望樓、宿舍、掩堡、木柵、電流鐵條、警察專用調查、以及隘勇線外零星散佈的「蕃屋」，凸顯隘勇線時代治理山地的辛苦意象。第二室展出「高砂族的生活」，使用泰雅族、鄒族、和排灣族共六個實體比例人形模型，並陳列他們的服飾、首飾、家具、農具、占卜具、武器、雕刻品等七十二項生活器物(見圖版十)；具體呈現不同族群的文化傳統特色。第三室展出「現今的理蕃」，則是以山地風景做為背景，配合陳列如教育所、交易所、療養所、神社、水田、果樹園、和鐵線橋等模型和器物，表現山地進步和現代化的意象(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協贊會 1935：349)。

<sup>20</sup> 例如其中台灣館「蕃人的武器」展示單元解說文字如下：「在此將各種族的蕃刀擺放在箭頭形的架上陳列；最頂端放的是鏢槍頭。刀是蕃人唯一的武器。木刀之外，其他都是漢人供給的。鎗是他們最重視的東西，有時即使拿妻子也不能替代。左方是排灣族的鎗。刀槍上經常綁繫頭髮為飾，這是表彰殺過許多人的勇敢榮譽標示。又，此圖左邊還有鄒族的弓矢和盾牌，右邊是泰雅族的鎗。據說鎗是在迄今約一百五十年前左右才有的，當時漢人蕃俗記事中提到『生蕃僅擅長弓矢和鏢槍，而非常害怕砲火。聽見轟然一聲，就抱頭遠遁』」；月出皓編 1903：56-57。





圖版七 1900年巴黎博覽會(左)與1907年東京勸業博覽會(右)展出的『台灣島蕃族相貌圖』(出自胡家瑜、崔伊蘭編1998:262;東京勸業博覽會写真帖1914)



圖版八 1903年大阪博覽會台灣館中「蕃族的食具」與「蕃族的武器」展示排列(月出皓編1903)



圖版九 1910年倫敦日英博覽會的「台灣館」入口  
(Commiss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1)



圖版十 1935年台灣博覽會中「高砂族的生活」展示室（出自臺灣博覽會事務局 1936）



由上述實例可知，博覽會內場異文化物質符號傳遞的訊息，並非單純客觀的異文化知識，而是一套隱含的意識型態和權力結構關係反射再現的異文化意象。展示中表達呈現的「理性」和「秩序」，主要是配合強勢統治者價值觀和利益的「理性」和「秩序」。因此，博覽會中展示的原住民器物，無論做為商品、標本、原始藝術品或工藝品，在不平衡的政經力量運作之下，經常轉換型式地重複表達種族差異和優勢者控制「他者」的權力。隨著異文化物質標本的採集、擺放、與組合陳列，一方面可以透過建構「異己」和「他者」野蠻、殘忍、落後、原始等負面意象，強調殖民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並傳達「他者」被現代文明「馴化」的訊息；另一方面，也能滿足觀眾對於「原真」的嚮往和「異國情調」的浪漫想像，讓人忘卻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令人不快的一面。最後，透過博覽會的消費和休閒娛樂特質，潛移默化地灌輸一般大眾對「他者」的想像，為階級化、進化或同化意識奠定根基。

#### 四、「真人」展示與「土著」活動

事實上，博覽會場讓觀眾覺得最新奇有趣、也最能滿足「異國」或「他者」想像的展示方式，應該是「土著村」內的「真人」展出。這種展覽模式大約在 1867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時形成，當時因為會場要建造埃及市集和突尼西亞店鋪，因此請了當地工人前來施工，後來發現觀眾對外來工作的人比對展示的建築物本身更有興趣。因此，1889 年巴黎再次舉辦萬國博覽會時，首次正式設立了「土著村」，讓展演者從家鄉帶來器物和工具在博覽會中進行生活展出。<sup>21</sup> 此後 30 年間，設置「土著村」成為博覽會的風潮；不同村落之間以高聳的圍牆隔離，每個村落經常安排 50 至 200 名「土著」在其中生活居住。有些「職業性土著」甚至受雇於博覽會活動籌辦公司，長期在各個博覽會場巡迴居住；他們以「土著村」為家，並照表定時在觀眾面前演出他們的生活、儀式和示範工藝品製作(Maxwell 1999：19-21)。

日本的殖民博覽會，也經常運用真人展示來增加「真實感」和趣味性。例如 1903 年大阪博覽會的『人類館』，安排有不同種族的「他者」男女住在會場展出。根據資料記載，除了台灣「生蕃」4 人之外，還包括北海道蝦夷(Ainu)5 人名、琉球人 2 名、朝鮮人 2 名、「支那」人(中國人)3 名、印度人 3 名，以及馬來住民、澳洲原住民、南洋諸島住民、非洲住民等不同種族，總計 23 人在展場設置的各族住屋模型中生活。由於這個展覽採取進化論的概念展出不同種族，當時引起中國人、琉球人和朝鮮人等激烈的抗議，認

---

<sup>21</sup> 這次博覽會開啟的「土著村」展示型態，後來成為英國、美國和其他各地「土著村」展示概念的原型；參見 Maxwell 1999：19。

為不應該將他們與其他「原始」種族一起展出。這一起著名的衝突事件，後來被稱為『人類館事件』(松村瞭 1903：289-291；吉見俊哉 1992：213；又吉盛清著、潘淑慧譯 1997：76)。

1910年倫敦的日英博覽會，安排了一次更大規模的台灣原住民「真人」生活展。當時博覽會場除了「台灣館」中有原住民器物的展示靜態之外，園區內還興建了一個將近1300坪的「福爾摩沙土著村」；村內由台灣總督府和英國博覽會籌辦公司的娛樂部門簽約，安排了南部高士佛社附近的二十四名排灣人(男二十一名、女三名)到土著村內長期居住展出(見圖版十一)。<sup>22</sup> 這些原住民是博覽會吸引觀眾的宣傳重點。由博覽會簡介的一段描述文字，可以看出當時向觀眾推銷「福爾摩沙村」的探奇觀異角度：「福爾摩沙村居住的是一位知名旅行者所形容的『全球最凶猛、最頑強的種族之一』。當然，那是在1895年日本佔領這個島嶼之前。大家可以看見這些好戰的福爾摩沙山區居民，住在自己建造的獨特住屋中，進行他們的工作和活動。他們的戰舞讓人顫慄，從戰爭示範中，可以看出他們精通弓矢和長矛。」(Commiss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1)。根據當時的報紙記載，「福爾摩沙村」內的配置是以『臺灣生蕃監督事務局』為中心，周邊有十二戶的蕃屋，每戶有兩位穿著盛裝的排灣人從上午11點到下午10點20分左右一直坐在屋內，觀眾需要花6便士買門票來參觀他們。由於這些來自台灣的「土著」比較活潑，喜歡用剛學會的英語向參觀者打招呼，因此很得觀眾喜愛；根據籌辦單位的記載「福爾摩沙村」大概是展覽期間觀眾人數最多的地方。<sup>23</sup>

然而，英國民眾究竟是如何觀看和理解這些遠渡重洋來到倫敦生活展出的台灣原住民呢？1910年9月9日《倫敦時報》(The London Times)有一篇關於「福爾摩沙土著村」婚禮儀式的報導，生動細膩地透露出一些「異文化」觀看的訊息。這篇報導並不太長，未免破壞字裡行間反映的觀看焦點，以下將引述全文：

「日英博覽會中，有一處特別值得注意的展出情景。上星期六下午，二個福爾摩沙村的村民，以最真實、最原始的方式舉行了結婚儀式，其中包括在大眾面前殺豬。新郎是24歲的青年 Sarongai Busabiree，新娘是21

<sup>22</sup> 根據記載：「明治43年2月21日，由於當時的大島民政長官和日英博覽會餘興評 Sinjigate」代表者 Julian Hick 簽訂合約，內容是讓24位排灣族男女出席博覽會。因此，當天由石川警部補板倉巡查(休戰)帶領他們，坐郵船加賀丸出發到英國。旅居倫敦期間，當時駐在那裡的福富礦務技師負責監督任務。翌年44年6月，蕃人回到臺灣，當時佐久間總督邀請他們到官邸，表揚他們這半年旅途中的榮譽表現，並送給他們東西讓他們帶回社中。」；鈴木作太郎 1932：374。

<sup>23</sup> 參考《臺灣日日新報》，1910/9/29、1910/9/30。

歲羞澀、迷人的少女 Rugigasela。這一對新人從小就訂了婚，是由新郎的父親為他的兒子挑選和訂下未來的新娘。新娘和新郎二人表示想要在倫敦日英博覽會進行期間舉行婚禮；因為他們希望能夠在日本天皇和偉大的白人國王見證之下結合。

當天清早村內就開始忙著用花葉裝飾。下午時，新娘和新郎暫時與其他村內土著隔離。其他土著環繞博覽會場遊行，他們手持武器、高聲唱著土著的歌曲。此時，那隻不幸的豬也在一旁等待成為鍋中煮熟的豬肉。在這隻動物被分解之前，『皇家防止動物被虐待協會』的督察員 Lovejoy、Hawkins、和 Houston，在獸醫師 Pinson-Case 陪同下在場監督，以便在必要時可以阻止土著不當的屠殺動物方法。當男男女女都圍聚在村落的中央時，接著二名男子扛著尖叫的豬出現了。一名男子很快地將長矛刺進豬的心臟；豬身立刻用柴火燒過、除毛、並且切成小塊。切好的豬肉塊接著被放入鍋內用炭火煮熟。在此之前，新郎要先去抓新娘。新娘抗拒、哭泣，不過新郎最後抓住她，將她揹在背後。二人被其他人簇擁圍繞著，一路吶喊推擠下，新郎將新娘背到小茅屋中，大家圍著一張桌子蹲著，用筷子傳遞食物分享。一只可愛的杯子被取來。大家開始飲宴歡樂，歌聲此起彼落。這些歌曲主要表達著『我們現在合而為一，我們彼此相愛』<sup>24</sup>。

這一場婚禮無疑是博覽會戲劇化展演的高潮；不過它不僅是表演，也是真實人生經驗的一部份。伊能嘉矩在同年 12 月《東京人類學雜誌》報導的一篇消息，記載了後續的發展：「參加博覽會餘興活動的 Ainu 和台灣生蕃(排灣族)，據台灣日日新報田原天南記者的報導，一位名為貝澤女的 Ainu 婦人於 8 月 31 日分娩一名男孩，命名為『英博』(Hit chiro)。9 月 25 日生蕃村內一位名叫 Rungayo 的婦人也平安產下一名男嬰。這名婦人從台灣出發前已經與一位名叫 Butsuaberi 的男子有婚約，但是還未舉行結婚儀式。他們 9 月 3 日在生蕃村內根據固有的習俗舉行結婚儀式。當時成為許多觀眾注視的焦點。婦人 9 月 25 日臨產時，在場內愛爾蘭村的看護婦和博覽會委託的英國醫師看顧下，於早上 8 點生產；母子都健康，男孩命名為『日英博』(Hit chiro)。生蕃村與 Ainu 村入場者人數雖然很多，是很受歡迎的展覽場，但是大多數人是因為好奇心而來，對人類研究有興趣的人很少。」(伊能嘉矩 1910: 125)伊能的這一段記錄顯示，日英博覽會場二個「土著村」北海道 Ainu 族和台灣原住民內，後來各有一名嬰兒出生。這二名嬰兒分別被命名為『英博』(Hit chiro)和『日英博』(Hit chiro)，博覽會經驗延伸為二個真實生命的標記。同時，

<sup>24</sup> Report in *The London Times*, 9 Sept, 1910。

伊能也在文中輾轉表達他內心的感慨，因為土著村在博覽會大受歡迎，並不是參觀者對人類研究有興趣，而是基於好奇的緣故。

當然，原住民真人展示的觀看經驗是雙向互動的。不僅博覽會的遊客和觀眾到會場觀看被展出的原住民，原住民也在參與活動的被看過程中，觀看和感受他們所處的「異己」社會。到倫敦參加「日英博覽會」展出的原住民回國後，就提到一些觀感的改變；例如被帶到倫敦博覽會對比呈現日本文明進步的台灣原住民，回來之後由於體驗了倫敦城市的繁華雄偉，反而感到日本不如英國進步。<sup>25</sup> 除此之外，一些生活上的影響變化還持續發酵，例如不少原住民在展覽期間存了些錢帶回村落；還有人學會說簡單的英文，在村中教兒童說著玩。當 1912 年英國學者 William Price 到來臺灣採集動植物標本的時候，曾經到英國參加博覽會的排灣族人還在高士佛社舉行了一場盛大的宴席，歡迎這位英國朋友。宴會中一位名叫 Tipo Sarogai 的排灣人發表了一段感性的致詞：「未離開這裡之前和到了英國之後，我們的想法完全改變了。我想，在世界上再沒有像我們這麼野蠻的種族了。我們應該立即脫離這些野蠻的習俗。要想脫離這些習慣，當然必須依靠學問的力量。今後，我們會努力地教育子弟逐漸進步到開明的階段。希望以後能夠有人能到英國留學，希望以後我們也能過著和世界其他人一樣的生活。」(Ishii 1916: 18-19；鈴木作太郎 1932: 375)。這一段記述當然具有官方傳達正面教化觀念的強烈意圖；不過卻也反映出真人展示的互動性。展示中被觀看的原住民，其實本身也是展覽過程中感知訊息和主動建構社會關係的主體。

以博覽會場做為原住民接觸體驗外在世界的場域，更普遍的一種方法是安排原住民前往會場參觀。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山地情勢比較穩定之後，開始挑選各地原住民代表到日本「內地」或台灣大都市觀光，而博覽會也是原住民觀光的重點之一。例如 1912 年「東京拓殖博覽會」舉行時，選派自泰雅各社的內地觀光團 43 人也前往參觀；1916 年「台灣勸業共進會」安排到台北參觀的各地原住民約有 600 人；1917 年的「新竹州展覽會」參觀者有新竹地區泰雅族約 170 人；1926 年「中部臺灣共進會」各地原住民與教育所兒童約 930 人參觀；1928 年東京舉行的「大禮紀念國產振興東京博覽會」，則有太魯閣原住民 45 人赴日觀光；1935 年「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達到最高潮，原住民前往台北參觀的人數超過 6500 人；1938 年「支那事變博覽會」時也有各地原住民約 638 人參觀。<sup>26</sup> 安排原住民到大都市和博覽會場觀光，主要具有示威的作用，希望藉

<sup>25</sup> 鈴木作太郎曾記錄到倫敦博覽會展出的排灣族人回來後的想法：「一位蕃人被問及客遊中的感想，他說：『倫敦市街的壯麗廣闊，工商業品的精巧，機器機關的雄偉，人馬物貨的往來交織頻繁，以及金銀財物的流通可能是台北的幾十、幾百倍。為什麼台北蕃務本署的廳舍那麼矮陋，卻沒有改建新的呢？』蕃人如此回答。」；鈴木作太郎 1932: 378。

<sup>26</sup> 參考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警察本署 1918-38；陳金田譯 1997；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1936。

著觀看現代化技術與文明社會的壯觀場景，讓原住民改變觀念並放棄反抗。但實際過程中，原住民外地觀光的經驗和感受卻經常是複雜而矛盾的，隨著不同的情境背景，在觀看和被看過程中相互建構。其中 1912 年「東京拓殖博覽會」的例子，能夠明顯反映出臺灣原住民做為展出者和觀看者的雙重矛盾角色。當時的博覽會場有台灣總督府安排居住展出的烏來社泰雅族 Bato Djiwas 一家 5 人；同時，另外又有選派到日本進行「內地觀光」而去參觀博覽會的宜蘭、桃園、南投、和台中等地泰雅男女約 43 人(圖版十二、十三)。<sup>27</sup> 這二批原住民，《台灣日日新報》分別稱之為「拓博蕃」與「觀光蕃」。前往博覽會參觀的「觀光蕃」，有二、三位來自桃園復興鄉，他們與在會場展出的「拓博蕃」Bato 夫婦原為舊識。二批人突然在他鄉異地相遇，因為太過訝異驚喜而當場哭泣，彼此真誠地相互關懷問候之後又再分離。這一段故事後來在報導中被當作佳話，認為是表現臺灣原住民「樸實純真」天性和情感的最佳典範。<sup>28</sup>

大體而言，殖民博覽會中的「土著村」展示，一方面滿足了觀眾窺視「他者」真實生活的想像，製造許多戲劇性的展出效果；另一方面又明顯具有將活人予以物化的傾向，被展出的真人經常被視為怪物、戰利品、或被當作科學研究樣本。由於這種展覽方式直接地限制、操弄、甚至剝奪了被展出者的生活和行動空間，強烈地反映展示者與被展示者之間的掌控和馴服關係；因此，雖然真人展示受到不少觀眾喜愛、吸引了許多人潮，但同時也遭到不少道德性的抗議和批評。1920 年代以後，博覽會場設立「土著村」並安排真人居住展覽的風氣逐漸衰減；博覽會場的真人活動，慢慢轉變成強調娛樂性與非生

---

1938:8, 1939; 台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 1916; 鹿又光雄編 1939; 《台灣日日新報》1912/9/26-10/10。

<sup>27</sup> 「拓殖博覽會」全名為「明治年間國運發展記念拓殖博覽會」1912 年 10 月 1 日在東京上野公園開幕，展覽為期一個月；主要目的是紀念明治年間國運的發展，向北到達樺太、北海道；向南至台灣、西北至朝鮮和關東州。博覽會除了介紹這些地方的天然物產、工藝品等之外，也希望將殖民地經營的知識、手段、方法，經由展示普及至一般民衆。會場設施主要包含：(1)台灣館，為中國龍宮式建築，有一阿里山扁柏造的大木門；其中展出天然產物米、糖、豆、茶、鹿皮、古文書資料、台北、台南、高雄建設模型、台灣生蕃細工、織布等器物等；旁邊並附有樟腦塔、烏龍茶室等；(2)樺太館；(3)朝鮮館；(4)北海道館、(5)關東州館；以及(6)會場外東京大學人類學教室坪井正五郎教授負責籌畫的「人類學館」；介紹日本版圖內人種和土人生活狀態。做為人類學參考的人種展出，除了台灣原住民一家 5 人之外，還有樺太人 4 名、北海道一家 3 名、Giliyak 人 3 名、鄂倫春(Orochon)人 1 名、和 Orroco 人等。10 月 5 日坪井還曾在會場的觀光館舉辦「人類學講演會」，會後舉行「六人種的握手會」，將參與會場生活展示的六人種：帶到會場與民衆握手，讓民衆結識新同胞。參考《台灣日日新報》，1912/9/26、1912/10/10、1912/10/11、1912/10/15、1912/10/17、1912/9/29、1912/11/3。

<sup>28</sup> 這一段故事在 1912 年 10 月 23 日《台灣日日新報》一篇標題為「觀光蕃與拓博蕃因奇遇的驚喜而哭泣」中有概略地報導。《台灣日日新報》，1912/10/23。

活性的族群工藝示範和歌舞表演，原住民主要扮演技術操作者和歌舞展演者的角色，按照時間和場次到特定的地點演出。例如，1935年的「台灣博覽會」就曾安排泰雅族人在戶外場地示範表演織布和傳統服飾，並且有阿美和排灣二個表演團體在露天舞台進行歌舞表演(見圖版十四)。

## 五、結 論

博覽會做為現代社會的一種特殊產物，它能夠聚集大眾，透過物質元素的公開展示呈現，傳遞特定的道德秩序和價值觀念，並在消費和娛樂過程中潛在地引導行為。隨著殖民主義的風行，十九世紀後半期至二十世紀前半期，博覽會的生產和製造達到最高潮，同時也成為政治勢力跨文化或跨國界較勁的重要場域。<sup>29</sup> 其中對於「他者」意象的展示再現，可以說是跨界互動過程的反射。自 1889 年的巴黎博覽會開始，博覽會的異文化展示重心從「東方」文化逐漸移轉到「原始」文化；「原始」族群被視為最能對比現代文明優越性的「他者」。以無文字社會做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人類學家，也因此經常接受博覽會的邀請而參與展示規劃或提供知識材料(Maxwell 1999: 19-21)。在這種時代背景底下，當時努力晉身國際世界的日本，也熱切地借用博覽會做為推動工商經濟發展、表達權力威望、與磨練殖民統治技術的一種有效機制。同樣地，在各種殖民博覽會中，日本也積極地展示台灣原住民；無論是面對西方世界、日本內地、或台灣都市觀眾，原住民從不同角度被運作為對照凸顯日本文明進步優勢的主要「他者」。由於原住民意象的展示再現，需要依賴物質標本和圖像的採集和掌控，以及相關知識體系的建立；因此整個展示意象的形塑建構過程，也與當時日本在台灣推展的人類學調查研究脫離不了關係。<sup>30</sup>

深入分析殖民博覽會的本質，可以發現在進步發展和歡樂的表象之下，夾雜著複雜矛盾的意識型態和不平衡的權力關係；而異文化展示正是傳遞這些訊息的重要管道。雖然，殖民博覽會建構的台灣原住民相關展示，隨著時空脈絡不同、掌控資源不同、主要觀眾對象—歐美西方人、日本人、台灣人、或台灣原住民—不同，其目的和作用也有差異；但是，其中形塑再現的文化意象，大致可以歸納出一些基本特性：(一)基於政治控制、經濟利益、知識教育、或文化獵奇等不同考量，台灣原住民相關的物質和圖像，被歸屬在「土產」、「土著」標本或「土著村」等範疇，是建構「自然」、「原始」與「落後」意象的象徵符號，也是展示者和殖民統治者相埒凸顯文明、進步和秩序階層的基礎。(二)博覽會的異文化展示不僅是差異概念的再現，更是對「他者」物質和圖像資料實際掌握

<sup>29</sup> 參考 Foucault 1977:216-217; Bennet 1995:64-65; Clifford 1997:204; Greenhalgh 1988:225-226。

<sup>30</sup> 參考陳偉智 1998。



圖版十一 二十四名排灣族人赴倫敦參加1910年日英博覽會前夕在台北合影（Ishii 1916）



圖版十二 1912年東京拓殖博覽會場內居住展出的泰雅族一家五人（臺灣總督府1912）





圖版十三 1912年拓殖博覽會期間到東京觀光的台灣原住民（臺灣總督府 1912）



圖版十四 1935年台灣博覽會的原住民表演（鹿又光雄編 1939）



和操控的過程；其中牽涉了選擇、採集、組合排列和說明詮釋等一系列支配和挪用的具體行動。(三)台灣原住民的「原始」、「落後」意象，在不同的博覽會脈絡，可以變化為不同層次的對比聯想；例如在台灣本島的博覽會，主要是強調台灣原住民/台灣殖民地現代化的對比；在日本內地的博覽會，強調的是台灣殖民地/日本母國的對比；在國際性的博覽會場域，則延伸為強調日本東方文明/歐美西方文明的對比。(四)博覽會中的展示對話，主要是經由物質符碼的組合再現而傳遞，這種模式比起口語或文字敘述，具有更多的模糊、流動、多義、彈性、異質並置、和堆疊累積等特性。因此，雖然不同階段日本殖民統治採取的「理蕃」策略，經過綏撫、圍堵、鎮壓、緩和、或同化等主要手法的變化；不過相似的原住民物質文化符碼，在不同的殖民博覽會中卻經常反覆運用，籠統對比區辨形成的「他者」意象，投射轉換為進化、現代化、教化、或同化等多種不同模糊曖昧的概念。<sup>31</sup> (五)博覽會不僅是觀念訊息傳遞溝通的場域，更是現代工業社會的休閒和消費機制，可以滿足中產階級獵奇探異，變換日常生活經驗的慾望。因此異文化展示經常是博覽會安排的宣傳和消費重點；而異文化相關的器物、習俗、或飲食，更是展示的主要範圍，用來營造奇異的觀賞和娛樂效果。經過博覽會華麗和歡樂的包裝形塑，再現的「他者」變成通俗的視覺消費商品；而其中隱含的權力關係、政治衝突、和矛盾糾紛，都掩蓋在夢幻式的世界文化展示櫥窗縮影下，遊客可以自由愉快地遊蕩、參觀和消費(Maxwell 1999：19-21)。

總之，博覽會中「他者」的展示再現，包含了複雜矛盾的互動過程；不但需要實際行動匯集並置各種物質和圖像，也必須在科學理性、社會控制、階級意識、好奇心、異國情調、和刺激消費等多種因素交錯牽扯中運作。透過博覽會，一方面將許多歷史過程和權力關係的矛盾簡化合理化與中性化；另一方面殖民者、被殖民者、展覽策劃者、展出者、觀看者的社會關係，也不斷在奇觀式的「他者」意象消費中延續。二次大戰結束後，由於國際政治和經濟形勢的變化，國家主導的超級大博覽會大為減少，運用博覽會做為政治勢力較勁和意識型態傳達工具的熱潮也急速消退。原住民在展示中的位置和主客體關係，也隨著時空情境移轉以及接觸互動的管道改變而出現很大的變化。雖然過去運用的一些「他者」意象符號，許多已經反轉成當代原住民建立自我認同時的基本元素；但殖民博覽會中流動延伸的物質和圖像符號，以及隱涵的權力和多重互動關係，仍然是理解異文化展示再現時不應忽略的重要關鍵。

<sup>31</sup> 博覽會中對於台灣原住民的展示，很少試圖詳細的文字說明或呈現「理蕃」政策和歷史；大多是以物件的陳列為主。只有一些台灣本島的博覽會，如1926年的「警察衛生博覽會」中「理蕃館」、1935年台灣博覽會設立「理蕃」展示廳，將「理蕃」的歷史過程做為展示重點。

附表一 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赴海外參加之國際博覽會(1862-1940)

年代	博覽會名稱	台灣展示
1862	英國倫敦博覽會	
1867	法國巴黎博覽會	
1873	奧地利維也納博覽會	◎
1874	英國倫敦萬國博覽會	
1875	澳洲雪梨/莫爾本/殖民博覽會	
1876	美國費城建國百週年博覽會	
1878	法國巴黎萬國博覽會	
1879-80	澳洲雪梨萬國博覽會	
1880	德國柏林漁業博覽會	
1881	德國礦業博覽會	
1881	美國亞特蘭大棉業萬國博覽會	
1882	國內工業展覽會	
1883	荷蘭阿姆斯特丹萬國殖民博覽會	
1883	美國波士頓技術與工業博覽會	
1883	英國倫敦漁業博覽會	
1884	英國倫敦衛生博覽會	
1884	俄國聖彼得堡熱帶園藝博覽會	
1884	英國蘇格蘭愛丁堡蘇利文博覽會	
1884-85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世界工業與棉業百年博覽會	
1885	英國倫敦國際發明博覽會	
1885	德國紐倫堡金屬工業博覽會	
1888	西班牙巴塞隆納萬國博覽會	
1889	法國巴黎萬國博覽會	
1889	德國漢堡工業暨商業博覽會	
1890	俄國聖彼得堡國際監獄博覽會	
1893	美國芝加哥哥倫布萬國博覽會	
1900	法國巴黎萬國博覽會	●
1902	俄國聖彼得堡漁業博覽會	
1902-03	法屬印度支那河內東京殖民博覽會	●
1904	美國聖路易路易斯安那購得博覽會	●
1905	比利時列日萬國博覽會	●
1905-06	義大利米蘭萬國博覽會	●
1907	美國詹姆士城三百週年紀念萬國博覽會	●
1910	英國倫敦日英博覽會	●
1911	義大利羅馬杜林萬國工藝博覽會	●
1915	美國舊金山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	●
1925	法國巴黎裝飾藝術與現代工業博覽會	●
1926	美國費城一百五十週年萬國博覽會	●
1931	法國巴黎國際殖民博覽會	
1933-34	美國芝加哥進步的世紀博覽會	
1935	比利時布魯塞爾博覽會	
1937	法國巴黎現代生活中的藝術與技術博覽會	●
1939	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	

◎ 台灣相關展示在清國安排下展出。

● 台灣相關展示在日本安排下展出。

附表二 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國內舉辦的博覽會

年代	博覽會名稱	展出期間(參觀人數)
1872	湯島(東京)文部省博覽會	
1872	京都博覽會第一回	
1873	京都博覽會第二回	
1874	京都博覽會第三回	
1875	京都博覽會第四回	
1875	熊本博覽會	
1876	松本博覽會	
1876	奈良博覽會	
1877	京都博覽會第六回	
1877	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東京上野)	08/21-11/30(約 45 萬人參觀)
1877	福井博覽會	
1878	奈良博覽會	
1878	名古屋博覽會	
1878	琴平山博覽會	
1879	京都博覽會第八回	
1880	宮城縣博覽會	
1881	第二回內國勸業博覽會(東京上野)	03/01-06/30(約 82 萬人參觀)
1883	水產博覽會	
1886	東洋繪畫共進會	
1890	第三回內國勸業博覽會(東京上野)	04/01-07/31(約 102 萬人參觀)
1895	第四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京都岡崎)	03/01-10/31(約 113 萬人參觀)
1895	五品共進會	
1897	第二回水產博覽會(神戶楠町)	
1903	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大阪)	02/01-09/10(約 530 萬人參觀)
1906	佐賀共進會	
1906	北海道共進會	
1906	五二共進會	
1906	米子畜產共進會	
1906	甲府共進會	
1907	東京勸業博覽會(東京上野)	03/20-08/31(約 680 萬人參觀)
1907	津共進會	
1907	第二回北海道畜產共進會	
1907	長崎水產共進會	
1908	福島共進會	
1908	北海道水產共進會	
1909	發明品博覽會第一回	
1910	長野共進會	
1910	福岡共進會	
1910	名古屋共進會	
1910	前橋共進會	
1910	關東北共進會(群馬)	
1910	貿易品博覽會第一回	
1911	神戶貿易製品共進會	
1912	東京拓殖博覽會(東京上野)	10/01-11/29(約 80 萬人參觀)

1913	大阪明治記念拓殖博覽會	
1913	富山共進會	
1914	第二回貿易製品共進會	
1914	東京大正博覽會(大正登基記念)	03/20-07/31 (約 740 萬人參觀)
1915	大典記念京都博覽會	
1915	大禮記念大阪博覽會	
1916	山形共進會	
1918	北海道博覽會	
1919	畜産工藝博覽會	
1920	福岡工業博覽會	
1921	大分共進會	
1922	平和記念東京博覽會(東京上野)	03/10-07/31 (約 1103 萬人參觀)
1923	發明品博覽會第二回	
1925	大大阪記念博覽會	
1925	東京乃木阪共進會	
1926	皇孫御誕生記念京都博覽會	
1926	市岡電器博覽會	
1927	東亞勸業博覽會(福岡)	
1928	大禮記念國產振興東京博覽會	
1928	御大典奉祝名古屋博覽會	
1928	大禮記念京都博覽會	
1928	東北產業博覽會	
1928	御大典記念全國馬匹博覽會	
1929	國產興業博覽會(鹿兒島)	
1931	北海道國產振興拓殖博覽會	
1932	發明品博覽會第四回	
1933	東京上野婦人子供博覽會	
1933	奈良觀光產業博覽會	
1933	宮崎市祖國日向觀光產業博覽會	
1934	國際產業觀光博覽會(長崎雲仙)	
1935	新興熊本大博覽會(熊本水前寺)	
1936	博多築港記念大博覽會(福岡)	
1937	國際溫泉觀光大博覽會(大分別府)	
1937	大阪產業工藝博覽會第一回	
1937	北海道大博覽會	
1937	名古屋汎太平洋平和博覽會	
1938	大阪產業工藝博覽會第二回	
1939	聖戰大博覽會(福岡大濠公園)	
1940	紀元 2600 記念日本萬國博覽會	

(參考吉見俊哉 1992: 19、127；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 1996: ii-x)

附表三 臺灣島內舉行之相關博覽會

年代	博覽會名稱	展出期間(參觀人數)
1908	台北物產共進會	[台北西門八角樓]
1911	臺灣南部共進會	[台南]
1916	紀念始政二十週年臺灣勸業共進會	04/10-05/15[台北] 共約 80 萬人參觀，含各地原住民代表約 400 人
1917	新竹州教育衛生博覽會	11/18-11/30 含新竹、南投、台中附近原住民約 170 人參觀
1925	始政三十年紀念展覽會	06/17-06/28[台北]
1925	台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	11/21-11/25 共約 26 萬人參觀，含台北、高雄原住民約 80 人
1926	中部臺灣共進會	03/27-04/07[台中] 含原住民與教育所兒童約 930 人參觀
1935	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	10/10-11/30[台北] 共約 273 萬人參觀，含各地原住民約 6540 人
1938	支那事變博覽會	1938/07[台北公會堂] 各地原住民 683 人參觀
1942	大東亞戰爭紀念博覽會	

## 參考書目

又吉盛清著、潘淑慧譯

1997 〈臺灣教育會雜誌——再版記及內容介紹(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3(3): 76-90。

月出皓編

1903 《台灣館》(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台北：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台灣協贊會。

月出皓編、伊能嘉矩閱

1907 《台灣館》(東京勸業博覽會)。東京：東山書屋。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

1992 《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錄總目錄—戰前期》第一卷。原書房。

吉井弘治

1910 《台灣館》(關東北共進會)。群馬：前橋印刷所。

吉田光邦編

1999 《圖說萬國博覽會史》：1851-1942，3 版。京都：思文閣。

吉見俊哉

1992 《博覽會の政治學：まなざし》。東京：中央公論社。

伊能嘉矩

1899 〈人類學教室とり來年巴里開設の萬國博覽會へ出陳有る可ち諸標本〉，《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63: 36-39。

1904 〈風俗上より見たる台灣館〉(1)(2)(3)(4)(5)，《台灣慣習記事》2(6): 76-83、(7): 77-85、(8): 75-80、(9): 86-89、(10): 79-83。

1910 〈日英博に於ける台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6(297): 125。

呂紹理

2000 〈「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之研究〉，《北台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25-35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

2002 〈展示台灣：一九〇三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館之研究〉，《台灣史研究》9(2): 103-144。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見元了編

1985 《臺灣省臺灣要覽二種—臺灣勸業共進會紀念臺灣要覽》。臺灣日日新報社。

坪井正五郎

1903 〈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之人類學〉，《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06: 301-302。

林文通

2003 《日治時期始政三十年紀念展覽會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協贊會

1939 《始政 40 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誌》。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協贊會。

松村瞭

1903 〈大阪の人類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05: 289-292。

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

1996 《內國勸業博覽會美術品出品目錄》。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胡家瑜

2002 〈殖民脈絡下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的收藏與展示—從馬偕到伊能嘉矩〉，「日本殖民主義與東亞人類學會—第一屆漢城會議」。韓國漢城大學校比較文化研究所主辦，2002/11/14-16。

胡家瑜、崔伊蘭主編

1998 《臺大人類學系伊能藏品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陳奇祿

1981 〈我和台灣研究〉，《民族與文化》頁 141-158。黎明文化。

陳金田譯、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997 《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紹馨

1948 〈臺灣山地同胞生活情形之民族學展觀〉，《公論報》，《臺灣風土》24，1948/10/25。

陳偉智

1998 《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鹿又光雄編

1939 《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台灣博覽會誌》。台北：臺灣博覽會。

程佳惠

2001 《1935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台北：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鈴木作太郎

1932 《臺灣の蕃族研究》。台北：台灣史籍刊行會。

劉融

2003 《日治時期台灣參展島外博覽會之研究》。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趙祐志

1997 〈躍上國際舞台：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5: 287-34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鄭建華

1999 《臺灣日治時期博覽會活動設計及其視覺傳達表現之研究》。台北：臺灣科技大學工程技術研究所設計學程碩士論文。

鄭梓

2000 〈戰後台灣的第一場「產業盛會」(1948)—首屆「台灣省博覽會」歷史影像之呈現與解讀〉，《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與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13-34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教育會

1996(1903) 《臺灣教育會雜誌》3(17)。台北：臺灣教育會。

臺灣博覽會事務局

1936 《始政 40 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寫真帖》。大阪細谷真美館。

臺灣總督府

1912 《生蕃觀光繪葉書—タイヤル族四十社の頭目五十二名一行》。東京：青木書店。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

1918-38 《理蕃志稿》。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1936-38 《理蕃の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

1916 《臺灣勸業共進協贊會報告書》。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

臺灣日日新報社

1912/9/26-1912/11/3 臺灣日日新報。

Ames, Michael M.

1992 “World Fair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the Ideology of Expo ’86.” In *Cannibal Tours and Glass Boxes: The Anthropology of Museums*, pp:111-131. Vancouver: UBC Press.

Anderson, Robert & Wachtel, Eleanor

1986 *The Expo Story*. Madeira Park, British Columbia: Harbour Publishing.

Benedict, Burton

1983 *The Anthropology of World's Fairs: San Francisco's Panama 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f 1915*. London & Berkeley: Scholar Press.

1994 “Ritual of Representation: Ethnic Stereotypes and Colonized Peoples.” In *Fair Representation: World's Fairs and the Modern World*, pp:28-61, Robert W. Rydell & Nancy Gwinn eds. Amsterdam: UV University Press.

Benjamin, Walter

1978 “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Reflections,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Bennett, Tony

1995 “The Shaping of Things To Come: Expo ’88”. In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pp: 209-228.

Burk, Bridget

1994 “World's Fairs and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Selected References 1987-1993”. In *Fair Representations: World's Fairs and the Modern World*, Robert Rydell & Nancy Gwinn eds.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ames

1997 “Museums As Contact Zones”. In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188-219. Cambridge, MA & London: Harvard Univ. Press.



## Commiss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 1911 *Official Report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0 at the Great White City, Shepherd's Bush, London*. London: Unwin Brothers, Ltd.

## Fletcher, H. Phillips

- 1905 *The St. Louis Exhibition, 1904*. London: B.T. Batsford.

## Foucault, Michel

-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Allen Lane.

## Geddes, Patrick

- 1900 "The Closing Exhibition: Paris 1900". *Prologue* 68.

## Gosden, Chris

- 2000 "On His Todd: 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In *Hunting The Gatherers: Ethnographic Collectors, Agents and Agency in Melanesia, 1870s-1930s*, pp: 227-250, Michael O'Hanlon & Robert L. Welsch eds. N.Y. & Oxford: Berghahn Books.

## Greenhalgh, Paul

- 1988 *Ephemeral Vistas: The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Great Exhibitions and World's Fairs. 1851-193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Penelope

- 1996 *Hybrids of Modernity: Anthropology,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Universal Exhibition*. London: Routledge.

## Hellwald, von. Friedrich Anton Heller Baron

- 1873 "Formosa as Represented at the Vienna Exhibition." *Shanghai Budget* Aug/ 30/ 1873. (translated from German).

## Hooker, William et al.

- 1855 *Notes of Some Remarkable Objects Exhibited in the French, Foreign, and British Colonial Departments of the Paris Universal Exhibition*.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 Hu, Chia-yu

- 2001 "Representation of Taiwan Aboriginal Art/Artifact—Entangled Images of Colo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Refracted Colonial Modernity in Art and Design of Taiwan'.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Taipei, Taiwan, 2001/08/30、31.

## Ishii, Shinji

- 1916 *The Island of Formosa Primitive Inhabitants. A Paper Read at a Joint Meeting of*

*the China Society and the Japan Society*, held at Caxton Hall, on Thursday, February 24, 1916, London: MCMXVI.

Kikuchi, Yuko

- 2001 “Refracted Colonial Modernity: Identity in Taiwanese Crafts from the Colonial Modern to the Contemporary National.”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Refracted Colonial Modernity in Art and Design of Taiwan’.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Taipei, Taiwan, 2001/08/30、31.

Maxwell, Anne

- 1999 “The Native Village in Paris and London: European Exhibitions and Theories of Race.” In *Colonial Photography and Exhibitions*, pp:15-37. London & N.Y.: Leicester Univ. Press.

Reid, Badger R.

- 1979 *The Great American Fair: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Chicago: Nelson Hall.

Rydell, Robert & Nancy E. Gwinn

- 1994 “Introduction.” In *Fair Representations: World's Fairs and the Modern World*, Robert Rydell & Nancy Gwinn eds.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Said, Edward W.

-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Silverman, Debora

- 1977 “The 1889 Exhibition: the Crisis of Bourgeois Individualism.” *Oppositions: A Journal of Ideas and Criticism in Architecture* 45.

Société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 Tourisme

- 1937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aris 1937 Arts and Crafts in Modern Life, Official Guide*. Paris: Societ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 Tourisme.

Société Exposition Universelle

- 1900 *Catalogue Special Officiel Du Japon: 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900*. Paris: Imprimeries Lemercier.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 1873 *Port Catalogu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Austro-Hungarian Universal Exhibition, Vienna, 1873: To Illustrate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roducts*. Shanghai: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Wallis, Brian

1994 “Selling Nation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nd Cultural Diplomacy.” In *Museum Culture: Histories, Discourses, Spectacles*, pp:265-281, Daniel J. Sherman & Irit Rogoff eds. Univ. of Minnesota.

News Corporation of The Times of London

1910/09/09 *The London Times*, London.

# **Great Exhibitions and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Images of Others in the Colonial Period**

Chia-Yu Hu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social and material contexts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great exhibition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colonial great exhibitions were not only devices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rade, promotion of industry and public education, but also for the progress and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powers. According to their localities, scales, and target audiences, the great exhibition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1)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held overseas which were targeted on western publics, such as the Paris Universal Exhibitions in 1900; (2) the great exhibitions held in Japan which were targeted on Japanese publics, such as the Fifth National Business Promoting Exhibition in Osaka in 1903; (3) the great exhibitions held in Taiwan which were targeted on Taiwanese publics, such as the Taiwan Exhibition in 1935 for celebrating the 4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of Taiwan. Indigenous exhibitions in these great exhibitions were generally to show 'otherness'. Through controlling, appropriating, assembling and representing indigenous material symbols, images, and sometimes living human beings in the great exhibitions, Taiwan indigenous exhibitions were managed to shape 'nature', 'primitive', or 'uncivilized' images

in order to contrast with the civilization, progress and superiority of the colonizers. Though similar material symbols and images for representing others were frequently appeared in different types of great exhibitions, various levels of oppositions had been focused in different contexts. For examples, in the international great exhibitions held overseas, the cultural images of Taiwan indigenes were used to contrast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Taiwan colony. In the great exhibitions held in Japan, it stressed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 colony and Japan mainland. In the great exhibitions held in western countries, it was extended to portray images of Japan as oriental civilization with colonial powers which could be parallel with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Under the cover of splendid carnival-like atmosphere in the great exhibitions, the imbalanced power relations and conflicts of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in colonial process had been neutralized and rationalized. In addition, these images of others were further transformed to become products for public consumption and entertainment, which repeatedly reproduced in the public domain. Although the relation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exhibition have been changed in the post-colonial period, it is still an important issue to examine the represented images of others and the fluid meanings of objectified symbols generated from the past.

**Key words:** great exhibitions, cultural images, exhibition politics, representation, material symbol, otherness